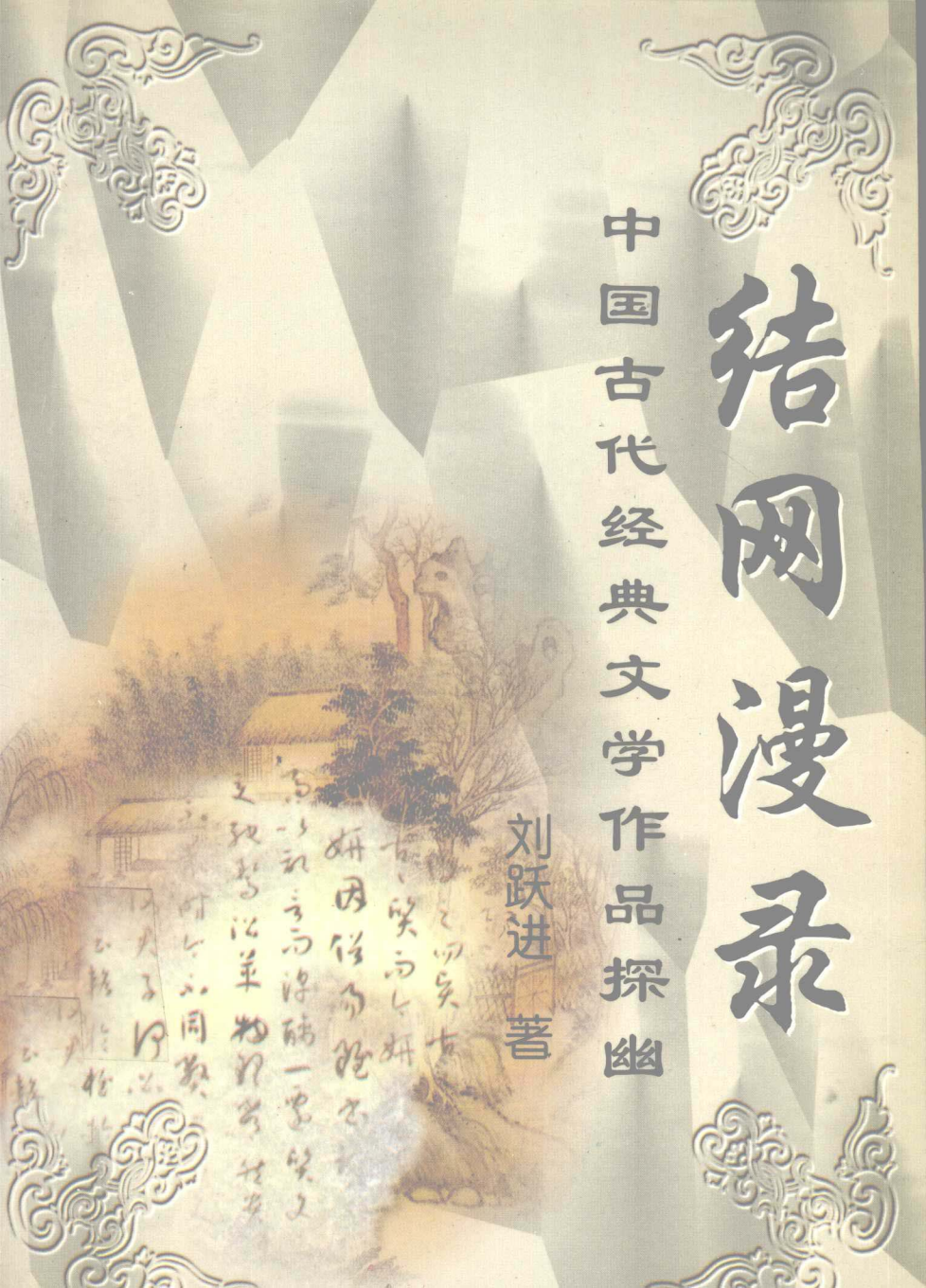


结网漫录

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探幽

刘跃进 著



古之笑而妍
妍因俗而能
高以之浮醅一
文雅以羊物
可之不同款
以之不同款
以之不同款

结网漫录

中国当代经典文学作品选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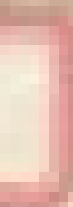
刘国凯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

（内部发行）

（每册）



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探幽

结网漫录

刘跃进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结网漫录·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探幽/刘跃进著. - 北京:学苑出版社, 1996. 10

ISBN 7-1171-4

I. 中… II. 刘…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 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4711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万寿路西街 11 号 邮政编码:100036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32 11.875 印张 250 千字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16.00 元

序

文学史的研究正像其他历史部门一样,要做好这种研究必须兼具古人所说“才”、“学”、“识”三个方面。当然,对于每个具体的研究者来说,情况可能不同,有的较偏长这一方面,有的较偏长那一方面,未必都能平均发展。因此对具体的研究者来说,也不必强求一致。但不管怎么说,我想三者的基础应该是“学”,因为不论“才”还是“识”都不是天生的,只有通过“学”,才能逐渐地产生“才”和“识”。这个道理我想大多数研究者和读者应该都能理解。

但“才”和“识”虽然来自“学”,却并不是每一个曾在学术上花过功夫的人都能具有“才”、“识”。这里就有一个方法问题。大凡在学术上能做出某些贡献的人,都是既能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因此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才能发别人所未发,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这样的见解也不是随便可以得出的,他必须对某些方面有所专精,才能深入地理解这个问题的底蕴,得出合乎事实的结论。因此前人曾经说:“为学要像金字塔”,这就是既要具有广博的知识作为基础,又要有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事实证明这种说法确为至当不易之论。具体到文学史的研究来说,过去的研究者,往往说到对“义理”、“辞章”和“考据”三者应该并重而不能偏废。这里所谓的“义理”,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作理论方面的探讨;“辞章”是指艺术成就的分析;而“考据”,则指历史事实、文字、声韵、训诂以及版本、校勘等一系列文献学方面的研究。这三种方法各不相同,却又相互为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古今中外的研究者们,其方法和成就尽管各不相同,却只是其所侧重的方面

有轻重之别。至于完全偏废某一个方面,就未必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些研究者,似乎对版本、考据等方面的研究有某种程度的忽视。这大约是因清代以来许多学者比较偏重这个方面,使某些人认为这方面的问题,前人都已基本解决,不必在此多下功夫了。事实的情况却远不是这样。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清以来的学者确实在这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但不论哪种学问,都是没有止境的,他们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也不是说已经把一切问题都圆满地解决了。再说古人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往往和今人不尽相同;更加上近几十年来由于国内许多私人藏书的公开流传,敦煌藏经洞和马王堆、银雀山的古写本及竹简、帛书的发现,以及久已流传到日本、韩国等地而在国内早已散失的古籍的出现,大大地扩展了我们的眼界,使我国对前人所作出而长期以来被视为定论的说法不能不有所修改。即以我们常读的《文选》一书而论,过去一些被公认的看法,都一一动摇了。例如:《四库总目提要》认为今存的《文选》李善注,是从六臣注本中辑出的,原本在宋代久已亡佚的说法,过去的人都是接受的。但自从有分藏于海峡两岸的北宋本李善注《文选》残卷的出现以及中华书局在七十年代所影印的与胡克家覆刻本有很大不同的宋尤袤原刻本的发行,这个看法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同样地现存的另一种《文选》注——“五臣注”,过去也被认为久已散佚。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现在我们知道的有南宋陈八郎本的“五臣注”《文选》,此书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还保存于江浙一带,后来流转到了台湾省。此外,在韩国,也还保存着另一种刊本的五臣注《文选》。因此有的研究者提出:不少人否定“五臣注”的意见是根据“六臣注”中文字得出的,“五臣注”的原本并不完全如此。又如《文选》中所载任昉的《奏弹刘整》一文,其中有不少文字,据一些研究者根据日本所藏古钞本校勘,证明为注者所引,误入正文。关于后两个问题,我现在

限于手头的材料，还难于作出判断，只能听取见过原始材料者的意见。从上面这些例子看来，似乎仅仅只是一个版本问题，但其性质，则必然涉及到对《文选》“五臣注”以及任昉文章的评价，甚至六朝文体、文章的艺术成就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文献学的研究其实是文学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还很不够。这是必须强调的。

对于文学史研究的文献学问题，我过去注意得很不够，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深切地体会到它的重要性。近年来虽然作了一些努力，但毕竟有东隅已逝之感，所以深深地希望比我年轻的同志，能够及年岁之未晏，先我着鞭，以建立坚实的基础。在这方面，刘跃进同志是做得比较好的。他在大学本科时，本是攻读古典文学的，在攻读硕士学位时，就转向文献专业，在版本、目录和考证学方面有了较丰厚的根底，然后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又回到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史方面。因此他的博士论文《永明文学研究》就掌握了很丰富的原始材料，提出了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得到许多前辈和同行的好评。正如有一位同志说的：“刘跃进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做到了‘竭泽而渔’的程度，把目前所能收集到的史料基本上都收集到了。”这个评价我是很同意的。

刘跃进同志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研究，是从“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沈约入手，逐步推广到同时代的谢朓、王融和整个齐梁时代，然后再上窥汉魏晋宋，下及梁陈，旁及北朝的《水经注》等书。由点到面，逐步推广，可以说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因此学风谨严扎实，这是他研究工作的一大特点和优点。他在深入研究六朝文学的同时，也丝毫没有放松文献学的研究，他的《中古文学文献学》一书，写得很有特色，材料丰富，经过几位同行专家的审阅，都认为是一部好书，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发排，不久当可问世。这部《结网漫录》，是他在完成了前面所说的两部专著之后的又一部有关古

典文献学方面的新著。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学术研究有两大特色:一是他尽管致力于六朝文学,但并不忽视其他相关文学作品的研究,如《〈篋中集〉与杜甫》、《〈全唐小说〉志疑》是下及唐代,而《六义与诗教》则是上溯先秦。这样就避免了局限于一个时代,而能更好地掌握史的脉络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文选》、《玉台新咏》和《金楼子》诸书的研究。他的《从〈洛神赋〉李善注看尤刻〈文选〉的版本系统》一文,比较全面地调查了现存的各种李善注和六臣注中有关《洛神赋》的注释,证明《洛神赋》题下所引的“记曰”,亦即有关“感甄说”的文字,虽为北京图书馆藏北宋本残卷及多种六臣注本所无,但也不能像胡克家《考异》那样简单地归结为尤袤所任意增加。因为在刻赋的“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数句下,不论北宋本残卷或明州本“六臣注”(五臣注在前本)、赣州本“六臣注”(李善注在前本),都有“此言微感甄后之情”的话,可见“感甄说”尽管不可信,但这种有关的传说早在尤袤以前,已经盛行并在李善注中已有所反映。他进而对《文选》在唐、宋二代的流行情况作了全面的考察,从《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考证了北宋本残卷的刊刻年代,并和此书的劳健跋文相印证,说明“北宋残本”也就是天圣明道间的国子监本。他又把北宋本残卷和中华书局影印的尤袤刻本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校勘,说明两本颇有异同,而尤刻则别有所据,证明在宋代,除了天圣明道间的国子监本外,还存在着其他版本系统的李善注,因为据李匡义《资暇录》记载,早在唐代,就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李善注本,而这从日本所藏古抄本和敦煌发现的残卷来看,这种情况是确实存在的。因此唐时几种不同的李善注,到宋时保存的也很可能不止一种,因此尤袤所据,可能别是一本。这种论点,显然是信而有微的。我在对陆机《挽歌》的次序问题的研究中,用《文选》、《乐府诗集》和今本《陆机集》进行对比,发现了郭茂倩所据,当为一个不

同于北宋本的李善注《文选》(详见《齐鲁学刊》1995年第1期),与刘跃进同志此说可以互相发明。

在《玉台新咏》的研究方面,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此书最好的版本就是明赵均覆刊的宋陈玉父刊本。这位“陈玉父”是谁?历来很少人知道,只有近人陈乐素先生作了考证,证明他就是南宋的目录学家陈振孙。刘跃进同志充分地注意到了陈先生的结论,并且对赵本进行了研究,对赵本就是徐陵原貌之说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目前虽尚未为学术界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我觉得他的怀疑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赵本据说出于陈玉父;而五云溪馆本也同样载有陈玉父的跋。两本都称出自陈玉父,而又颇有出入,那么孰为真陈玉父本,就要详加研究,很难简单地执此非彼。更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国内外一些学者既已封赵本为徐陵原貌,便据此来考定梁代许多作家的生卒年先后,一以此本为据。但他们认定《玉台新咏》成书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左右,然而此书录有刘孝绰的《元广州景仲座见故姬》一诗。据史载,元景仲于大通三年(529)始为广州刺史,而元景仲的被征还建康,则在大同二年(536),原因是元景仲父元法僧于是年病重,不久死去。那么元景仲的能设宴待客并设姬妾,必须是在父丧服阕之后,亦即大同四年(538)以后,那么情况就和一些学者所说成书于中大通间的说法矛盾。再说在赵本中,萧子显的作品是收在第八卷之首,显然是作为尚未去世的作者收入的,而萧子显却卒于大同三年,即元景仲服丧期满以前。那么又和那些学者之说出现抵牾。因此对此书现有的说法提出质疑,我觉得不但是完全有理由的,可以发人深思。当然对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也许还要继续深入地研究。但刘跃进同志对《玉台新咏》的看法,还不止于此,他提出了入选《玉台新咏》的作品,都是在当时可以演唱的歌辞之说,我看此说当属确切之论,这只要看《文选》所未收,而见于《玉台新咏》的作品,很大一部分都可以在《乐府

诗集》中找到,就是一个有力的根据。

关于《金楼子》,过去的研究者似乎很少涉及。以我所知,只有海外某些学者,曾作过一些探讨,但其所涉及的问题似乎较小,也未能为多数人认同。刘跃进同志的《关于〈金楼子〉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则涉及的范围较广,而且提出了不少重要的问题。他从全书中所述史书的年代一一作了排比考校,论定此书的写作前后达三十余年之久,对萧绎著书的用力之勤,论证得令人信服。对《金楼子》一书的内容,诸如当时的藏书情况、《金楼子》和古小说的关系以及萧绎的个人的思想和政治野心都一一一条分缕析,作了细致详实的论述。应该指出的是《金楼子》这样一部比较重要的著作,我们过去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即以我本人而论,在近年出版的《南北朝文学史》中,就没有加以注意。因此读了此文,得到了很多启发。

刘跃进同志在文学、历史和版本、目录等学方面具有很坚实的根底,他又孜孜不倦,勤于研究、思考和著述,自从取得博士学位以来,又写出大量富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在学术上,我们经常交换意见,有时常作数小时的长谈,对我常有启发。古人说“教学半”,正是这种情况。在他的《结网漫录》成书之际,要我作序,我当然是乐于从事的。因此写了上述的一些话,是否得当,还请跃进同志和广大读者们指正!

曹道衡谨序于中国社会
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一九九六年元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序	曹道衡
---------	-----

第 一 辑

昭明太子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	(1)
有关《文选》“苏李诗”若干问题的考察	(17)
从《洛神赋》李善注看尤刻《文选》的版本系统	(35)
《玉台新咏》版本研究	(47)
一、《玉台新咏》版本叙录	(47)
二、《玉台新咏》版本考异	(84)
《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新证	(103)
七言诗渊源补证	(127)
道教在六朝的流传与江南民歌隐语	(135)

第 二 辑

“六义”与诗教——读《毛诗序》臆札	(145)
关于上古、中古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152)
关于《金楼子》研究的几个问题	(169)
《篋中集》与杜甫	(190)
严羽评李白诗资料摭谈	(196)

极摹世事炎凉 曲尽人情变态

——从《忧庵集》窥探戴名世晚年心态 (204)

第 三 辑

南朝五史校点稽疑 (218)

关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编撰方面的一些问题 ... (224)

关于《水经注校》的评价与整理问题 (241)

《全唐小说》志疑 (282)

通行本《曲品》校补 (297)

朱骏声著目述略 (314)

后 记 (329)

第一辑

昭明太子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

天监元年，刘绘死。二年，范云死。七年，任昉死。十二年，沈约死。至此，永明文学最主要代表作家相继谢世。这标志着文学史上一个历史段落的结束。^①与此同时，梁代后期一些重要作家还未登上文坛。沈约死时，庾信刚好来到人世，徐陵三岁。他们的父辈在文坛虽已崭露头角，但庾肩吾、徐摛在文坛真正产生影响实际在梁代后期，也就是在中大通三年萧纲被立为太子，他们成为萧纲文人集团的骨干之后。从天监十二年到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死，其间十有八年，实际是昭明太子文人集团独擅文坛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作者颇众，创作亦丰，号称“晋宋以来所未之有也”。^②不过从现存作品来看，他们的创作成就不仅还不能与元嘉三大家即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相媲美，而且也没有达到永明三大家即沈约、谢朓、王融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与梁代后期一些重要作家如庾信、徐陵等人的艺术成就相比，他们在许多方面也显得颇为逊色。平心而论，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在前后两个文学高潮之间呈现出平缓发展的态势，成就平平，还没有出现一个足以彪炳文坛的作家。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文人集团毕竟给后世留下一部影响

① 钟嵘《诗品》以沈约为入评的最后一位作家，《昭明文选》也主要收录沈约以前的创作。曹道衡、沈玉成先生《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认为，这“确实在文学史上标志着一个历史的段落”。

② 《梁书·昭明太子传》。

极为久远的《文选》，毕竟较早发现了陶渊明的真正价值，毕竟创作了一些为数不能算少的文学作品。仅此而言，这个文人集团就值得深入探讨。

一个文学集团的形成，起码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相当的作家群体，二是近似的创作倾向，三是相通的文学主张。《南史·王锡传》载：

十三为国子生，十四举清茂，除秘书郎，再迁太子洗马。时昭明尚幼，武帝敕锡与秘书郎张缵使入宫，不限日数，与太子游狎，情兼师友。又敕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为学士，十人尽一时之选。

屈守元先生《昭明太子十学士说》^① 据此推断说：“王锡十四岁为天监十一年，这时萧统十二岁。十学士的设置，这一年的可能性最大。”这个推测，我觉得不能成立。《梁书·王锡传》：

十四举清茂，除秘书郎，与范阳张伯绪齐名，俱为太子舍人。丁父忧，居丧尽礼。服阕，除太子洗马。时昭明尚幼，未与臣僚相接。高祖敕，“太子洗马王锡、秘书郎张缵，亲表英华，朝中髦俊，可以师友事之。”

说明王锡十四岁时与张伯绪同为太子舍人，与张缵共同侍奉昭明太子是在王锡丁父忧、服阕之后。王锡父王琳，史传未载其卒年，但据王锡弟王玠传记可以考知。《王玠传》载，玠“八岁丁父忧”。王玠太清二年底卒，时年四十五岁。据此而知，王玠父卒于天监十一年。这年王锡十四岁，除秘书郎，时间很短，即丁父忧。其“服

① 见《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阁，除太子洗马”至少在天监十四年以后。^① 又据《南史·张缵传》：

起家秘书郎，时年十七。……秘书郎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不数十日便迁任。缵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书籍。尝执四部书目曰：“若读此毕，可言优仕矣。”如此三载，方迁太子舍人，转洗马、中舍人，并掌管记。缵与琅邪王锡齐名，普通初，魏使彭城人刘善明通和，求识缵与锡。缵时年二十三，善明见而嗟服。

按：张缵太清三年被杀，时年五十一，其十七岁为天监十四年，又任秘书郎三载。就是说，张缵为太子舍人当在天监十七年(518)。上文载缵与锡共见刘善明，亦见《王锡传》。《通鉴》系此事在普通元年末。若依张缵年二十三而推，当是普通二年。史传称“普通初”当亦不错。据《梁书·庾於陵传》：“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稍事补充说明的是，所谓甲族，大多指渡江甲族。像王规，为东晋开国重臣王导之后；谢举为刘宋谢庄之后。两人均起家秘书郎，随即迁太子舍人。《梁书·王规传》：“父忧去职，服阕，袭封南昌县侯，除中书黄门侍郎，敕与陈郡殷钧、琅邪王锡、范阳张缅同侍东宫，俱为昭明太子所礼。”王规父王骞卒于普通三年，这在《梁书·太宗王太妃传》中有明确记载，说明王规亦在普通年间从游东宫。十人中，唯有张率、陆倕、到洽有些例外。张、陆为东南豪族子弟，到氏门第不如其他渡江士族高，其所以出入东宫，亦非偶然。陆倕为梁武帝西邸旧友，张率被梁武帝誉为“东南才子”，到洽门第虽低，却以“清言”驰名一时。^②张率先任秘书丞。萧衍说：“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

① 两晋丁父忧用王肃说，两年零五月。南朝用郑玄说，两年零三月。至少都在两年以上。

② 《梁书·到洽传》载梁武帝问丘迟到洽与溉、沈异同。丘迟说：“正情过于沈，文章不减溉，加以清言，殆将难及。”

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天监八年随晋安王萧纲，“在府十年”，天监十七年“还除太子仆”，“俄迁太子家令，与中庶子陆倕、仆刘孝绰时掌东宫管记。”十学士中，到洽和陆倕最早侍奉昭明太子。据《梁书·到洽传》载，天监七年，到洽“迁太子中舍人，与庶子陆倕对掌东宫管记，俄为侍读。侍读省仍置学士二人，洽复充其选。”“十四年入为太子家令”，“十六年迁太子中庶子”。普通五年“复为太子中庶子”。从这些材料看，十学士之游东宫，早自天监七年，晚至普通初，方聚齐。再从王锡、张缵、张率的行迹推测，十学士并聚集在东宫，主要在天监末到普通七年陆倕死前这七八年间。

其时，不止上述十学士从游东宫。到溉、殷钧、殷芸、陆襄、何思澄、刘杳、刘勰等亦为东宫重要学士。《梁书·殷芸传》：天监十年“除通直散骑侍郎，兼尚书左丞，又兼中书舍人，迁国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读”。《梁书·何思澄传》：天监十五年为徐勉荐举与刘杳等五人撰《华林遍略》，“久之迁秣陵令，入兼东宫通事舍人”。说明这些人多是在天监后期侍从昭明太子的，与十学士不相先后。可以说，这些人是昭明太子文人集团最主要的骨干力量了。

与这个文人集团先后辉映的，前有沈约、任昉于天监初年奖掖后进，围绕他们而形成的作家群体，后有以萧纲、萧绎兄弟为首的文人集团。把昭明太子文人集团的人员构成和流向与前后两个文人集团作些比较，是很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

萧纲曾组织编撰《法宝联璧》，中大通六年，萧绎为该书作序，末尾罗列了三十八位编者的姓名、官职。可以这样认为，这些是萧纲文人集团的中坚人物。有趣的是，昭明太子十学士中，只有王规一人入选。王规与萧纲的关系非同一般。萧纲的宠妃王灵嫔是王规的姐姐。其余的学士，除陆倕、张率、到洽、张缵、王锡等卒于此年前外，都还活跃一时，正处于创作旺盛时期，但这时都未曾进入萧纲文人集团。刘孝绰可能“母忧去职”，姑且不论。王筠在昭明

太子死后，曾著《昭明太子哀策文》，颇见称赏，但并未留居京城，而是“出为贞威将军，临海太守，在郡被讼，不调累年”。^① 张缵大约正在吴兴太守任上，直到大同二年才被征回。^② 谢举任侍中，亦不从萧纲游。《梁书·刘杳传》载：“昭明太子薨，新宫建，旧人例无停者。”后一句话是很耐人寻味的。这说明萧纲有意不用昭明太子的旧部，不是偶然的现象。除了文学主张不同外，恐怕还有政治的因素。^③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昭明太子的许多侍从是来自永明作家任昉、沈约门下的。陆倕不必说，本来就是竟陵八友之一，是永明重要作家。其他如《南史·到溉传》载：

梁天监初，昉出为义兴太守，要溉、洽之郡，为山泽之游。昉还为御史中丞，后进皆宗之，时有彭城刘孝绰、刘苞、刘孺，吴郡陆倕、张率，陈郡殷芸，沛国刘显及溉、洽，车轨日至，号曰兰台聚。

按《南史·陆倕传》称此为“龙门之游”。《梁书·到洽传》也载：“乐安任昉有知人之鉴，与洽兄沼、溉并善，尝访洽于田舍，见之叹曰：‘此子日下无比。’”据《姓解》所称，到溉、张缵、张率、张缅、刘孝绰、刘苞、刘显、刘孺、陆倕并称为兰台十学士。其中有六人后来进入东宫。六人中，除陆倕外，与永明作家关系最紧密的要算刘孝绰了。其父刘绘是永明重要作家。孝绰幼年就深得“父党”沈约、范云、王融、任昉等人的赏识，被目为神童。其他作家，如殷钧、殷芸、到溉、

① 《梁书·王筠传》。

② 《梁书·张缵传》：大通“三年入为度支尚书，母忧去职，服闋，出为吴兴太守。”“大同二年征为吏部尚书”。

③ 昭明太子死，立萧纲为皇太子，“废嫡立庶，海内尊喏。”袁昂、周弘正等并提异议，要求立昭明子为太子。见《南史·袁昂传》《周弘正传》等。萧纲能被立为太子，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不能不考虑到昭明门下旧部的失意不满，所以“例无停者”，以减少麻烦。